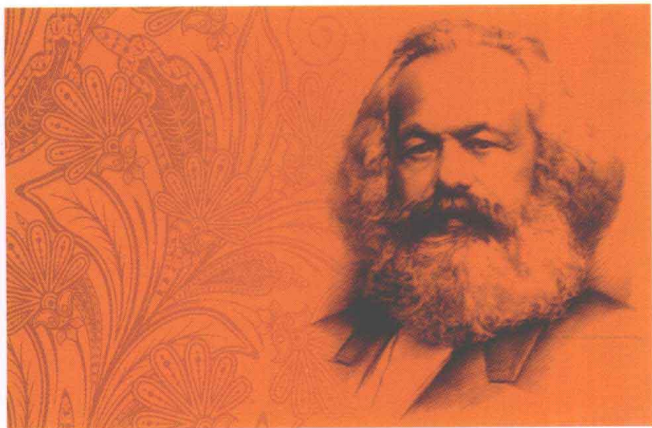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主编

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

MARXISM AFTER MODERNITY: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英】罗斯·阿比奈特 著
王维先 马强 嵇明亮 译 李鸣镝 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

MARXISM AFTER MODERNITY: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英】罗斯·阿比奈特 著
王维先 马强 嵇明亮 译 李鸣镝 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
/(英)阿比奈特(Abbinnett, R.)著;王维先,马强,
嵯明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2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214-06628-2

I. ①现… II. ①阿… ②王… ③马… ④嵯…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外国—现代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991号

Marxism after Modernity: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 2007 Ross Abbinnett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Marxism after Modernity* by Ross Abbinnett.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e 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0-045

书 名	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
著 者	[英]罗斯·阿比奈特
译 者	王维先 马 强 嵯明亮
责任编辑	唐爱萍
装帧设计	王欣竹 芮 玲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9.125 插页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628-2
定 价	3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总序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套《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的译者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信、达、雅”的翻译尺度是不懈的主观追求,但在客观上,译文中还存在着不少应由译者自己负责的舛误与主体认知之二次建构的痕迹。当然,二次建构的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依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译介此套丛书的背景,是正值 21 世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甚嚣尘上之时。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亦难独善其身,“风景这边独好”的断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盲目乐观主义泛滥的表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主张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霸主地位遭遇严冬,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种轻率预测的阴影。但是,全人类共有天空上的阴霾并未散去,在 21 世纪的第十个年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被放置于一个广域空间中重新慎重审视,人类内部的纷争必须在人类是生存抑或死亡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让步了!经济萧条、全球发展失衡、民族与宗教冲突仍然难以摆脱。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人类自我制造的副产品——自然枷锁又重新禁锢于自身。在需要



人类共同携手应对的生态浩劫面前,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疯狂本质,也应该更为清醒地反省社会主义的自我处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理解社会、自然、宇宙和文明的出发点,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由其所达到的洞见非其他思维方式所能替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惧怕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与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会拒绝任何对之理性探究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凭借不同文化谱系思考方式之探索,能够发人深省,并获取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开启人类生存的崭新空间,以提升我们社会的生活品质与人类的生存境界。

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范式与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作为思潮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不同文化场域中也相互抵牾,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的有效整合、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与空间等方面,仍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逻辑一致性。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虽然历经风雨,不断遭到批判和围剿,但在困难与挫折中,它不仅在东方大地得到充实、发展和检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也得到充实、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成为当代全球思想中一股强有力的国际性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复兴、发展、壮大,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从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中挑选出这6本著作,绝非因为作者的名气,关键在于其作品本身的特色与厚度,以及对中国

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效考量。当展开书页,进入到另外一种话语体系中去认知马克思主义时,应带有一种虔敬的态度去体悟异文化领域的学者之所思所想。诚然,站在简单化与迷信化的立场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绝难从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取科学与知识。心智的开启需要诉诸感情上的热爱,但更要诉诸理性之光的照耀。译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学说,既有助于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助于拓展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充满危机却又蕴含契机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生逢此时,他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做何种指引? 他的理论体系是否会得以做某种程度的修正? 这些疑问是推动出版本译丛之动因所在。世界上未有全知全能者,但人类可借助于前人智慧的累积,去思考与探索消除生存危机之道,走向光明的前路。

这正是此译丛之愿景。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2011年1月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意识形态、美学和大众文化	009
第一节 唯物主义与意识形态	010
第二节 文化的物化	020
第三节 游戏化审美主义的兴起	034
第四节 资本主义与超真实	047
第五节 意识形态与差异	062
第二章 资本主义与技术	077
第一节 机器与社会化生产	079
第二节 技术统治论的起源：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	092
第三节 文明化的资本主义机器：德勒兹和内格里	102
第四节 技术效应的伦理学：德里达和斯蒂格勒	126
第三章 全球化与新国际	144
第一节 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	145



第二节 世界市场与全球转型	155
第三节 “生物政治”生产与“新民主科学”	163
第四节 超经济的资本主义	175
第五节 “好客”政治学	185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政治	205
第一节 马克思与资本的力量	206
第二节 后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	214
第三节 阶级政治的条款	234
第四节 结语	246
参考文献	251
索引	265
译后记	283

引言

1

马克思的思想与现代性的开始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割裂它与中世纪之后在欧洲出现的启蒙哲学、经济合理化、科学技术创新与社会去传统化的历史承接关系，那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特征，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机制的一种日益迫切的感觉——借助这些机制，旧的封建秩序正在被一种新型的、基于通过商品销售而获得利润的新制度所取代。当然这个运动过程很复杂，旧制度不会轻易让位于新制度，从而进入了一个与异军突起的商业资本和制造资本形式激烈冲突的时代。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由商品形式引发的生产合理化趋势代表着世界的未来；因为依赖于绝对权威和古老的农本主义的封建经济最终是无法与建立在城市的新型贸易和生产方式竞争的。因此，一种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在 19 世纪初的欧洲就出现了；尽管农业生产仍占主导地位，但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把商品的货币交换确立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确定有关自由公民权的法律条款，并将生产的合作体制扩展为多元多种类的手工业生产。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集中于他的哲学与市民社会那残暴而又矛



- 盾的现实的接触点上。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Philosophy of Right*)试图通过绝对精神的范畴,即统一性、特殊性和差异——黑格尔在《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和《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Mind*)里阐述了它们的辩证运动——的超经验形式来调解这种接触(Marx,1977c:27)。因此,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进行论述时,黑格尔以这样一个假设开始:自私自利的个人组成了商业活动的领域,他们构成了一个工具性联系(*Instrumental connections*)网络,而这个网络最终在国家的实质性公共道德中得以实现(Hegel,1967b:154-155)。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超验统一性的假设,先于资本的物质运动,这将他的政治思想引向了某种复古主义(*archaism*);因为虽然他是率先思考经济个人主义(*economic individualism*)对伦理生活(*Sittlichkeit*)有机联结的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但他的哲学却回到了将封建制度视作解决市民社会道德错位的方法的组织结构上来(同上:152-155)。所以,马克思倡导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不仅仅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更重要的是,它设定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生产方式中的经济与技术转型被理解为是对社会纽带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整合的不断修正。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的扩张所再次产生的不平等,仍有一定的道德意义,这种意义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伦理生活应该将精神的自主分化反映到它的隐性/客观和显性/主观的范畴中去。而马克思认为这些不平等是商品生产的固有属性;因为个体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断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压低工资,加大对机器技术的投入,提高总体剥削率。本书主要论述的正是这一逻辑——这种普遍的暴敛经济

(economy of expropriation)。

《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明白,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既是落后的又是进步的,既是野蛮的又是文明的。一方面,它带来了人类生产潜力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建立了一个囊括所有可以想象的商品的国际市场。然而,在另一方面,货币—商品—货币(M-C-M)关系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继续剥夺大多数工人应得的社会产品份额,使他们从自己本质的自我创造性上异化,并产生了一个普遍贫困的人类阶级(Marx, 1998: 3-16)。因此,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思想:大工业资本主义的演变将商品形式的逻辑(即为了克服由于将机器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中而引起的利润下降,而不断地强行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推向经济彻底被危机摧毁的程度,有机劳动的贫困化会导致革命性变革的手段(国际无产阶级)。这里留给我们两个重大问题。其一,就19世纪末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来看,继续认为资本主义的普遍革命趋势仍是由古老的货币—商品—货币(M-C-M)关系所决定的——即由对工人的前所未有的剥削而导致的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失业和通货膨胀等不断深化的危机所决定的,这是否仍然可信?其二,资本主义的媒体—技术—科学(media-techno-scientific)结构调整是如何影响到了阶级斗争的革命辩证法的?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这两个问题的历史。从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就试图在修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同时,继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就像本书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我对研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后现代重构”与这种重构



赖以构思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Harvey, 1999: 344)。我们很熟悉哈维的观点,他采用了与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共同的逻辑。争论在于,一群非常令人怀疑的法国知识分子——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及让·弗朗索瓦斯·利奥塔(Jean-Francoise Lyotard)——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概念,总体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伪装形式:对“差异”的不懈追求,被认为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尊崇;对“总体化的话语”的批判,被作为一种对正义的普遍原则的抛弃而提出;而对审美的变革力量的坚持,则被作为一种从日常生活政治学向前卫派自我服务的知性主义的退却来叙述。因此,从实质上讲,后现代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相去不远;因为马克思所发展的方法论原则要求,一个资本的批判理论至少应保持一种纯粹“差异”的政治契合(complicity)的意识,一种普遍原则——这个原则应该去支配一个适当民主的社会——的意识,以及一种大众一致性的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力量的意识。

- 4 然而,和所有的概括一样,这个概括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对抗的呈现,依赖于一个几乎是任意的决定——即,忽略鲍德里亚、德勒兹、德里达和利奥塔对马克思以及他们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之间关系的实际看法。但我们终究还是应当记住,他们都是这场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未来的、席卷学院内外的思想论战的参与者。当然,对这种关系的

进一步研究,有可能会使得那些怀疑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知识姿态的人,批判更加尖锐。不过我觉得,尽可能精确地去说明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交战的条件并评估这种交战的政治蕴涵,在知性上仍然是正当的。

然而,在开始本书的阐述结构之前,我想明确一下使用“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rnist)、“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这些术语的方法。这些术语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用语,因此,它们也获得了一套相当特定的含义:某人生活方式是“后现代的”,就是说他采取了一种对愉悦和满足故意的讽刺态度,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极其易变的,并始终如一地愿意接受通过全球经济传播的新型差异。这些含义显然很重要——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产生于跨国资本主义的霸权之中的文化意义世界(universe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的组成部分。然而,如果认为这些含义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精髓,那就错了。因为它们经过了意识形态调解过程的过滤,而这个过程倾向于过滤掉它们的伦理和政治诱因(provocations)。因此在本书后续的讨论中,我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等术语的使用仅仅是作为对鲍德里亚、德勒兹、德里达和利奥塔著作的集体指称;换句话说,我使用这些术语是为了方便起见,并非想要将一种集体意图归咎于无关于现代性的“所有无聊和束缚的东西”(Jameson, 1998: 111)的一种集体意图。如果在某种意义上我给予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以特殊优待,那么基于如下理由,这或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的研究关注的是这些思想构成资本主义的技术—科学调整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承诺的方式。



我故意没有选择对照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综合历史来展开我对后现代思想的阐述,因为像佩里·安德森^①和马丁·杰伊(Martin Jay)^②这样的学者已经以极大思想说服力和严谨性完成了这项工作。我的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出发点,因为我将研究的主题(媒体、信息
5 和假体修复[prosthetic]技术的兴起、真实的模拟、全球经济的构成、审美想象力的丧失),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第一次作为马克思主义正典的问题而出现。所以我将第一章根据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马克思意识形态主题的改造,去探讨美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不再重视简单地歪曲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图像功能,而是转向一种更为一般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真实(the real)通过文化工业的再现折射出来。正是这种转向——朝着鲍德里亚所谓的“第三级”拟像(simulacra)的转向——揭开了再现的后现代问题;因为如果在技术上可复制的图像已经获得了一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超过了简单掩盖的逻辑的自由,那么,就有必要去重新思考现实、本体论和政治构成等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实质。我在第二章中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技术—科学创新问题及其对商品形式所造成的冲击上。该章的出发点是马尔库塞(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提出的海德格尔派技术控制理论,该理论将

① Anderson, P. (1998)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Verso.

② Jay, M. (1984)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马克思对工业生产的分析拓展到了固定资本和有机资本、“技术”与“人”的对立之外。换言之，马尔库塞的著作表达了一种内在的趋势——人类的劳动被以“假体修复”(prosthetic)的方式融合到技术资本主义体制之内。德勒兹、内格里(Negri)、鲍德里亚和施蒂格勒(Stiegler)都对这种趋势最极端的蕴涵进行了探讨。第三、四章关注的是源于后现代主义全球技术理论的政治姿态与安德森、卡利尼克斯、艾哈迈德(Ahmad)与伊格尔顿所信奉的那种更为正统的阶级政治学构成之间的关系。第三章论述的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好客”(hospitality)、游牧(nomadism)和群众(multitude)等概念去改造马克思的“工人国际”思想的可能性，而第四章探讨的则是那些继续(必须继续)维持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论战的对立。

因此，作者写作该书的目的并非是要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诀别，而且我也很留心地把我将要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技术与革命的著作进行了比较。如前所述，我解读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他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以及他试图去搞清经济合理化、道德个人主义和商品崇拜的影响的尝试。当然，他的这种批判，要求我们完全抛弃黑格尔——他试图将一种内在的伦理意义灌输进市民社会的道德、法律和政治关系之内；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形式释放了一种剥夺的增值逻辑，而这种逻辑又被它自身实施的意识形态形式强化了。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论证思路。如理查德·迪恩·温菲尔德(Richard Dien Winfield)就认为，黑格尔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只是商品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其统一的结构”，因此，市民社会的要素(抽象的差异、交换、个体化和道德责任)组成了一个表达公平经济



的普遍实质的有机整体(Dien Winfield, 1998:131)。^① 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关系的分析,是以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力量为前提条件的;因为如果有一条贯穿于后现代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指导线索的话,那条线索就是搞明白复杂性、分解(disaggregation)和技术假体的逻辑——商品形式通过它们强化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决心。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推理导致了对马克思阶级政治学观念的强烈质疑。这种质疑集中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再次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和政治构成逻辑上。因此,我的意图是勾勒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轮廓——这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它们都试图追溯资本的技术—科学转型,揭示这些转型对“人类”有机构成的影响,并从理论上论述这些影响的政治后果。因为我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探究,我们才会最大限度地接近马克思侵入资产阶级伦理生活的辩证法这一“事件”。

^① 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在《黑格尔与社会学》(*Hegel Contra Sociology*)中深入地分析了黑格尔伦理生活学说表述的必然性的“疑难性”。

第一章 意识形态、美学和大众文化

这一部分主要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再现根本性不平等的能量的问题——资本主义把这些不平等作为解放、正义和自由的必要条件。首先,我将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统治阶级思想”(ruling class ideas)的论述进行回顾,因为这本书是马克思首次系统地论述作为图解和推论(graphical and discursive)形式的艺术、文学、哲学、伦理学和神学的作用——它们将一个阶级统治另一阶级合理化了。第二节论述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点的研究,尤其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及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试图在理论上阐述图像的技术复制与公共领域的大众化之间的关系。第三节则是批判地检验这样一种观点:即,伴随着图像的技术解放而来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和文化,不过是全球经济中的政治对抗的意识形态偏离而已。第四节发展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关于仿真的著作,既提出了文化工业命题可能的最坏结果,也引发了对资本、技术和表现之间关系进行重新思考的观点。